

部定大學用書

中國歷史通論

遠古篇

黎東方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部定大學用書

中國歷史通論

遠古篇

黎東方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再版

(95670滄熟)

大部
學用書

中國歷史通論(遠古篇)

滄熟熟料紙

定價國幣貳元貳角

印圖地點外另加郵費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著 者

黎 東 方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本書原係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中國史
學叢書丙輯第一種經館決定列入部定大
學用書

國立編譯館大學用書編輯委員會謹誌

序

中國的歷史在世界現有各國中，稱爲最古；中國史學的發達，也比較地是最早；但是我們直到今日，還沒有一部能比於歐美各邦所已有的關於本國歷史的大學課本。原因是：過去中國的史書，大都爲史料性質，很少有全部一氣呵成，能讓人一氣讀下去的。我們要想於短期內改變中國史書的形式，使得牠能夠在史實的編排上含有邏輯的次序，在史實的敘述上能表現一種有機的整體：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教育部爲了這個緣故，特地組織了史地教育委員會，邀集各地專家來共同研究這個問題。大家的意見是：從分門斷代與綜合三方面來同時着手。一方面先寫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經濟、藝術等等各個部門的專門史，作爲未來的綜合工作的基礎。同時，把通史分成十個斷代，請十位專家來分工合作。

這兩種辦法，都是假定現今中國近代史學的發達程度，尙不容許我們立刻從事綜合的嘗試。但是史地教育委員會仍就決定了，再請幾位先生，每人寫出一部通史，不必等待分門研究與斷代研究的完成。爲了什麼呢？爲了各地大學的急迫需要；也爲了供給未來的通史作家，以若干『先鋒的記錄』。

這原是一種不情之請。誰都知道，寫通史比較寫分門史與斷代史，要更容易失敗。因此，有好幾位先生，都覆函婉謝了；但也有幾位先生，很勇敢地擔負了這一種爲別人開路的使命。東方兄是史地教育委員會的委員兼秘書，曾經負了邀約撰述人的責任，便告訴這幾位先生說：『倘使你們萬一失敗，我願意陪你們失敗』。因此，東方兄也答應寫一部中國通史，便是這一部『中國歷史通論』。其中議論的地方，較普通的歷史書稍多，所以不叫做『通史』，而叫做『通論』。

東方兄能否把這一部中國歷史通論寫好，自然要等到全書完成之日，我們纔能夠知道。我們確有理由，可以希望他不致失敗。他是一個慷慨而富有勇氣的人，只要他能堅持下去，以長期的毅力來貫徹這一件十分艱鉅

的任務，則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很大。他於中國舊有史學與西洋近代方法及歷史哲學，均有過很好的師承，十幾年以來，他始終不曾離開教讀寫作的生涯。單就學力來說，我們是可以替他樂觀的。

但在中國歷史的研究，實在不易。年代之長，幅員之廣，事件之繁，比起任何一國的國史來，就已經困難得多。況且法德英美諸國，歷史學界的組織已有相當規模，有很豐富的史料已經編排妥善，便於抽查；有很專精的史家已經各守崗位，便於諮詢；又有很新穎的涉及各個事實的專書，可供參考。這些，在我們中國，雖非全付闕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尚在開始萌芽的狀態之中。

東方兄說，他要用哲學來補救科學之不足；用革命的精神來迎頭趕上西洋史學的成果。他以為只要有了哲學見解，便可以貫串那些性質極為紛歧的複雜事實；只要有了革命精神就可以結合全國專家，把中國史學界迅速地組織起來，工作起來，不僅可以給他以諮詢請益的便利，而且可以提高中國史學的水準，到國際的史學界中去爭回應有的地位。

在哲學的見解上，我與東方兄是一致的。我們都服膺 總理孫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生存是進化的中心，民生是歷史的中心。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以為生產力之發展，常與一時代的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因而促進階級鬥爭，造成社會進化。他只看到社會的病態，沒有看到社會的生理；又只看到生產的一面，沒有看到消費的一面。韋廉氏的社會史觀，就比他進了一步。總理則認為民生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民生問題之所以發生，由於人人均有求生存的慾望，到了不能完全滿足之時，就成為問題。一成了問題，所牽涉的就不僅是經濟一方面的事實。

過去人類的進化，總理以為可以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人與獸爭，人類努力征服毒蛇猛獸；第二階段是人與天爭，人類逐漸解除了寒冷飢餓的壓迫，求得食衣住行基本需要的解決；第三階段，是人與人爭，人類有了相當的文明以後，結合為強有力的民族組織，部落組織，與國家組織，互相爭奪領導的地位或實際利益所在的草地、水田、商場、礦山。將來應該是人再與天爭，人類因為道德的進步，知道了互相殘殺的惡毒，

認識了互助才能促進進化，服務才是人生的目的，於是便努力於大自然蘊藏力量的開發和利用，拿科學來代替戰爭。這第四階段的人類歷史，現在尚屬於黎明時期，未曾真正開始。

我們因此可以認清，經濟現象並非如馬克思所說，可以稱為下層建築，把政治與學術等等列為上層建築，以為下層的經濟建築有移動，上層的政治學術等等就要跟着移動。反之，經濟現象與其他現象是互相影響，分不出孰為下層，孰為上層。倘若我們一定要辨別孰為較重要，孰為較不重要，則隨着每一階段的歷史，而各有不同。就大體的輪廓來說，則當人與獸爭的及人與天爭的階段，經濟的活動自是佔着首要的地位；到了其後，人與人爭，政治事變就要成為關係最大；最後，人再與天爭，大家努力以「創造」來替「佔有」與「支配」，當然學術的作用要成為最有力量。

就我們中國的歷史來說，我們也是先看到有採拾的時期，漁獵時期，牧畜時期，農業時期等等，都可以用經濟的字眼來分期。到了有了農業，或農業漸成主要的生產方法以後，從堯舜直至清末，我們就沒有方法再用經濟的字眼來分期，我們只有以政治上的朝代來分期才較為便利。清末以後，科學逐漸發展，但離開那學術能夠完全領導政治與經濟的階段，還是很遠。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進化，現今都尚在第三階段「人與人爭」之中。理想中的第四階段的實現，尚待吾人作更大的努力！

歷史單就時間的一方面來說，是決不重演；但兩個時代若有互相類似的因，也可能獲得互相類似的果。單就空間的一方面來說，是各有其地方性；但兩個地方各種條件大體相同時，也可以拿來作一極巧的比照。我們中國的歷史，在全世界的歷史之中，佔有極光榮的地位。牠至少於下列幾點，全與其他各國的歷史不同。第一，牠的文化是五千年以來一脈相承，綿延不斷，非比埃及巴比崙之倏已泯滅，印度希臘羅馬之面目全非。第二中國在五千年以來的對外關係中，最注重的是文化交流，其方法則採用德化，只有拿文化來教育落後的鄰族，沒有侵略或「殲滅」的企圖。中國對外，從來沒有什麼「假想敵」；因此也就沒有什麼「死仇」。第三，中國有自己創造的特殊文化，在所有其他各民族的文化之中，為最接近於人性的一個。惟其最接近於人性，故

對於人與人的關係，研究得十分清楚。孔子所提倡的「仁」，總理孫中山先生所闡揚的「民生」與「天下為公」的道理，都由此中心觀念出發。孔子與總理是前後兩位集大成的聖人，仁與公二字，是在他們兩個人以前中國文化發展的結晶，也就成為中國人多數奉行的道德觀和歷史觀。

倘使我們並非爲了歷史而研究歷史，而是爲了有所貢獻於人類才研究歷史，則我們寫歷史也決不能僅爲歌頌古人或貶斥古人而寫，應該爲激勵今人，指導今人而寫。簡括地說，我們要爲了創造歷史而寫歷史。在這一方面，東方兄也頗以鄙意爲不謬。我很希望在他的書中，能多有一些具體的提示，與建設性的結論。

直至今日，我們還沒有一部從民生的觀點來寫成的中國史。其實，僅僅是關於民生史觀的闡明，也還是不夠。我們必須要在中國的歷史之中，研究出來中國民族的特性和特點而予以發揚，歷代對外關係有無足供組織戰後和平機構時參考之處，歷代政治經濟制度的演變有無足供吾人今日建國時參考之處。

倘若東方兄此書，能於將來完成之時，滿足上述的要求，那就不僅是一部合於理想的大學教本，且爲一般國民所不得不讀之書。牠就可以產生實際的效果，而不單單是學術範圍內的一件成績。

陳立夫

目次

陳立夫先生序

第一章 年代、地域、人種.....一四

第二章 從氏族到帝國.....三三

第三章 遠古經濟.....四七

第四章 「中華遠古之文化」.....六四

參考書目.....八九

附錄.....八九

遠古史表一 重要年代.....九〇

遠古史表二 古今地名.....九九

遠古史表三 三代世次.....〇一

遠古史表四 重要事蹟.....〇一

附圖

三皇後及五帝都邑圖

禹貢九州圖

夏室遷徙及商朝部族圖

西周封建圖

中國歷史通論（遠古篇）

第一章 年代、地域、人種

中國的歷史已有幾年？從那一年開始？

爲了回答這一類的問題，我們可以依據各種性質不同的史料。

第一、是有年代可稽的正史。在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之中，有一篇十二諸侯年表，把西周共和元年以來直至周敬王以後一年，每年所發生的大事，都記載在裏面。他又寫了一篇六國表，是接着周敬王逝世的次一年，卽周元王元年，直至秦二世的三年，也記載了每年的大事。從漢高祖開始，我們因爲有司馬遷所寫的高祖本紀、呂后本紀、孝文本紀、孝景本紀、（註一）與班彪班固所寫的漢書、范曄所寫的後漢書、陳壽所寫的三國志、唐太宗所敕修的晉書……等等，直至民國以後，清廷遺老所纂修的清史稿，（註二）每朝每帝每一年的大事，都一一有了記載。因此，二千七百五十二年之間，（註三）我們的「歷史」從未間斷。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其他的民族所不能比擬。（註四）

第二、是當時的史料。所謂「當時的史料」，又稱「直接史料」，是古代某一時期的實物或記載，遺留或出現於今日的。就目前的情形而論，（註五）我們的最早「當時實物」，是商代的若干銅器（註六）與若干龜甲獸骨；（註七）我們的最早「當時記載」便是這些銅器上的銘文，與這些龜甲獸骨上的卜辭，以及更早於這些銘文與卜辭的尙書盤庚篇。（註八）盤庚是商代中葉的一位帝王，可惜我們還不能確定他卽位與逝世的年代。

第三、是可信的後世記載。這是幫助我們來推定「共和」以前的年代的。所謂「後世」，並非距離「當

時」很遠。例如一個周朝的人，他寫夏商兩朝的事，一定可以根據很多我們今日已不能有的材料；因此，他所寫下的記載，雖及不上「當時記載」的價值，但是仍舊可以有相當的可信程度。屬於這一類的，有左傳裏面若干片段的故事，（註九）尚書裏面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等篇，（註一〇）詩經裏面的蕩篇魯頌、商頌，（註一一）以及史記裏面的五帝本紀、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與三代世表。（註一二）尤其是這史記裏面的幾篇記載，可以稱為集既往史料之大成；其中殷本紀一篇，所敘商代世系，竟與二千年後所發現的甲骨文記載大體上不謀而合，（註一三）增加了全書的價值不少。有了司馬遷的努力，黃帝以來虞、夏、商、周的史事已經大致可信。剩下的，是這些史事距今究有幾年。因此，我們便不得不訴於另外一種史料：即

第四、較可靠的後事推算。共和元年，相當於公元前八四一，民國紀元前二七五二。在共和以前，西周尚有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十王。厲王在位有三十七年，這是已經載於史記而無庸推算的。從武王至厲王究有幾年，漢書律歷志還留給我們以劉歆的推算。劉歆精究古歷，著有三統歷、三統譜及世經，根據他的推算，我們可以知道從武王元年至幽王十一年，共有三百五十二年，（註一四）武王元年是三統上元以來的第十四萬二千一百一十年，（註一五）相當於公元前一一二二，民國紀元前三〇三三。

商朝的年數據劉歆的推算，共有六百二十九年。這與左傳的傳述恰相一致，（註一六）成湯伐紂之年是三統上元以來的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明年成湯元年，便相當於公元前一七五一，民國紀元前三六六二。

夏朝的年數據劉歆所引帝系，是四百三十二年；（註一七）與「古本竹書紀年」所載的四百七十一年，稍有出入。但古本竹書紀年，自稱這四百七十一年，（註一八）包括夏朝「有王與無王」之年。所謂「無王」，是指的寒混篡據夏位后緡及少康逃居有虞之時，依照通鑑外紀所引甲子會紀，寒混（註一九）在位共四十年，其最後一年即少康復國之一年，實得三十九年，則加上四百三十二年，適為四百七十一年，兩說並無衝突。（註二〇）因此，大禹即位之年，應為公元前二二二二，民國前四一三三。

第五、是近代的科學發掘。夏禹以前，惟有堯舜二人，劉歆曾附帶記述其在位年數，一為七十，（註二一）

一爲五十；（註二二）但是並未加以歷譜上的證明。倘若我們更遠溯而及於黃帝，便僅有漢昭帝時代的丞相屬僚竇及長安人單安國、安陵人樞育等所共同推算過的數字：黃帝元年至元鳳三年（公元前七八）爲三千六百二十九，似乎黃帝元年即是公元前三七〇六，民國前五六一七。所惜漢書律歷志並不會保存下這三人的論據，而且同時另有太史令張壽王暨稱黃帝以來至元鳳三年，已不止三千餘歲，而有六千餘歲。今日俗傳黃帝元年爲公元前二六九七，是混合了晉朝皇甫謐（註二三）與宋朝邵雍（註二四）的假定，歷史學上的價值很低。

我們爲了明白中國的歷史究已多久，必須從事於地下的發掘。截至今日，中國各地已有新石器、（註二五）舊石器、（註二六）甚至始石器（註二七）的發現。關於新舊石器所佔的時期，按照世界其他各地的通例，合計應有五萬年左右，（註二八）至於始石器，其時進步極慢，年代自應較之新舊石器尤久。

我們中國，又有周口店原人骨骨的發現。牠的年代，一般學者假定爲五十萬年。（註二九）牠的形狀，雖未必與近代的中國人酷肖，但是在生活上確爲仰韶人的前驅，而仰韶人正與現代的中國人同種，所以「北京人」也未嘗不可以認作近代中國人的祖先。（註三〇）

中國的歷史，倘就開始有中國人的時候來計算，應該是不少於五十萬年；倘就開始有民族的時（所謂三皇）來計算，應該是不少於五萬年；倘就有部族的時候（所謂五帝）來計算，應該是不少於六七千年。這些，便是中國的史前史。倘就有年代可稽的時候來計算，則我們可以斷自唐虞，或斷自大禹，而中國足資徵信的歷史，便可以說，是開始於公元前二三四二（唐堯）或公元前二二二二（大禹）。

在最古的時候，中國人住在什麼地方？是在黃河下流，抑爲黃河中部？或根本不在黃河沿岸，甚至是外來的？

這最後一說，現已不能成立。周口店之中國人遺骨，既與近代中國人有關，仰韶村等地的新石器遺址，亦充分證明其生活習慣與近代中國人相同（例如食豬）。（註三一）華於西來之說，無論拉古派哩（Lacouperie）包

爾 (Ball) 及費爾 (Vigot) 諸氏如何努力，僅能爲古代東西文化之溝通可能，作一暗示，而不足視爲定論。(註三三)至於中部，渭水黃河之交叉處，地利誠屬肥饒，究不及下流河淮三角地帶之更有利於初民文化之發展。此三角地帶，不僅有天然的泛濫代替灌溉，使得居民早日獲有「尋找食品」以外的閒暇，以從事於文化即改善共同生活的活動；並且交通便利，眼界遼闊，易生求進步的慾望。拿世界其他古國的歷史來參證，埃及有尼羅河的三角洲，印度有恆河的三角洲，巴比崙也有所謂「兩河流域」(註三三) (Mesopotamie) 都足以支持我們的觀點。

比起這些三角洲來，我們河淮合成的一個大三角地帶要廣闊得多。(註三四)牠北起天津，南及阜寧，掩有山東海岸線的全部，及河北江蘇兩省海岸線的一部，包括了山東全省與冀南蘇北皖北豫東；三角形的頂點，又及於平漢鐵路線以西。遠古的中國若干氏族，如風姓的太皞氏，嬴姓的少皞氏，姜姓的神農氏，以及姬姓的軒轅氏等等，都是分佈於此。

在這一片三角地帶的上面，有不少的森林與湖沼（今日俱已絕跡），(註三五)更有很多的毒蛇猛獸。這些毒蛇猛獸，有許多是屬於熱帶的，(註三六)反映當時當地的氣候之暖。豐富的水草，使得游牧者樂於定居。又有便利的水道，使得定居了以後的部落，易於彼此接觸，交換發明，或結爲婚姻，併合爲較大團體。

就形勢而論，曲阜似乎是一個中心，牠位於秦山的山麓，於便利的地域之中，擁有了——個不便利於交通的屏障。牠屬於黃河三角洲，卻有泗水把牠聯接到淮河流域。牠北通濟深，南通淮泗，西邊面對河淮腹地，東邊又有尼山、魯山、泰山層層的垣牆。在平時，牠是交叉的午道，在戰時，牠是難攻的要塞，這真是可戰可守，不愧爲少皞氏與神農氏的累代都城。

曲阜以外，北爲河濟之間的濮陽，南爲俯瞰淮河諸支流的淮陽，均甚重要。淮陽舊稱陳州，離今日商業中心的周家口不遠，是太皞伏羲氏的家鄉，也是神農氏未遷曲阜以前的都城。濮陽在周朝稱爲帝丘，是古代帝王的邱墟，(註三七)顯頊氏世世代代的根據地。

以上述三個重要都邑爲出發點，中華民族於遠古的期間，已經把力量與文化輻射到四面八方去。近而淮河海邊，固然是很迅速地打成一片，稍遠而渡淮以南，跨海以東，包括了所謂荊州，揚州與今日的朝鮮。（註三八）北邊，遼東遼西及察哈爾，自然是屬於宇內；南邊，由三角地帶溯河而西，及於河渭合流之處，轉北，有蒲坂（永濟縣），再北，有平陽（臨汾縣），或再向西，與所謂雍州，即渭河盆地，連成一片。這僅是就書面上的史料，畫出一點輪廓。倘就地下的寶物史料而論，則中國型的新石器，遍佈於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山西、甘肅，南及於浙江，北及於蒙古，而蒙古「沙堆居民」(dune dwellers)所遺留的「沙石文化」(Shabarata culture)在世界各處的新石器遺址之中，且能自佔一特殊地位。（註三九）於此，可見中華民族最初的活動範圍之廣。

我們民族在遠古時候的構成份子如何？是單元的，一系相承，由一人氏族而擴充爲一大民族呢？抑爲多元的，由若干氏族，甚至若干種族，互相混合，而形成爲一個新的民族呢？

以一人而繁衍爲一大民族，自不可能。我們尊黃帝爲共祖，自稱爲黃帝子孫，無非是崇敬他的功業，公認他爲遠古祖先中之第一人而已，其意義正如敬崇總理爲中華民國的國父。但是以一人而衍爲民族雖不可能，至於氏族，則確可由一人的子子孫孫逐漸形成。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一人的子孫倘若有好幾房，並且可以繁衍爲很多的氏族。國語上說，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註四〇）者十四人，爲十二姓，（註四一）則黃帝的子孫已經可以有十二個氏族。（註四二）每一個氏族，仍可逐漸由每一代的次子三子分祧出去，以創造新的氏族（在商朝稱爲「子族」）。這些新的「子族」，倘與原來的「母族」聚居或「聚游」在一起，便成了很龐大的一個「部落」。

再進一步，由部落而部族；更進，由部族而民族，就很難單靠血統的關係。即就血統而論，除非在婚姻方面永是行的內婚制度(endogamy)也沒有一個氏族或部落能夠保持百分之百的祖先血統。總理在民族主義中說，構成民族的要素，血統以外，尚有語言、宗教、風俗、生活。語言的化合，宗教的傳播，風俗的仿效，與

生活的共同，均能幫助血統，使得若干不屬於一個團體的人，成爲一個團體。

按照史記，唐、虞、夏、商、周五個朝代的天子，均是黃帝一人的苗裔。而黃帝以前，如姜姓的神農氏等，尚不能確定他們與黃帝的血緣如何，（註四三）或指出在三皇時期左右，能否有一位黃帝的前驅，作爲三皇與五帝的共祖。事實上，所謂三皇，不必定是三人；五帝，也不必定屬一家。我們可以看作，當時是若干氏族部落，或部族，分別並峙，初則不相統屬，繼乃互相結合的一個時代；不相統屬的前期氏族社會，可以名之爲三皇；互相結合的後期氏族社會，可以名之爲五帝。問題仍舊回到：當時居於河淮三角地帶的若干氏族，是否屬於一個種族？

此一問題之解答，其前提爲，究竟種族的區分，以什麼作標準？在中國的典籍上，只有華與夷的區別，沒有種族上的區別，而所謂華夷，又僅爲文明程度的不同。（註四四）可以說，我們的祖先，不存什麼種族的界限，只存文明不文明的界限。並且蠻夷戎狄的姓氏，常與「華人」相同，（註四五）所不同的，的確只是「衣服飲食」。（註四六）十九世紀以前的人種學家，喜稱中國人爲黃種，而自居爲白種，（註四七）未知與他們「同出一系」（註四八）的印度人，其膚色之黃，尤黃於中國南部的居民。到了二十世紀，英國韋爾斯氏也承認了他們並非白種，說猶就膚色而論，他們應該被稱爲粉紅色種（Pink race）。（註四九）膚色，可見已不能作爲人種區分的標準。至於勒鄉得氏（Legendre）以中國北部人爲白種，南部人爲黑種；而大部份爲白黑混血而成之黃種，更屬無稽。（註五〇）其次是髮狀，最近的人種學家，以輕髮、直髮、拳髮，分人類爲三大種族；歐澳人爲輕髮種，亞洲人爲直髮種，非洲人爲拳髮種。（註五一）這一種說法，現今仍能流行，其實輕髮直髮之分，與嬰孩生下以後有無剃髮的習慣，頗有關係。（註五二）最後，是頭蓋骨，有寬頭窄頭之分；（註五三）豈知中國人之比較多數，均爲不寬不窄之頭（Mesaticephales）。（註五四）倘就全數而論，則寬頭的傾向，較爲顯著，窄頭的數目僅占百分之八點三。然而亞洲的居民，除了喜馬拉雅山以南之印度人及日本北部之蝦夷人，幾乎全部皆爲寬頭的一類，尤其是薩摩人、突厥人、與東胡人。（註五五）然則現有的中華民族之各支族，均尚與幹族（漢族）同屬一個人種，何

況古代河淮三角地帶小小區域以內的份子呢？（註五六）

（註一）武帝本紀原稱今本本紀，但今本武帝本紀則爲「褚先生」（少孫）所續。

（註二）歷代正史之本紀，均採編年體裁，故朝代得以相接，事實不致闕斷。

（註三）自共和元年至宣統三年，共爲二千七百五十二年，民國以來之歷史已由國史館從事編纂。

（註四）法國歷史學家考第埃氏（Henri Cordier）曾於其所著中國通史中對於此點備加讚美。

（註五）中國考古發掘之工作，在北伐後曾有甚大之進步：現因抗戰而略受頓挫。但成都附近某處因建築廣大飛機場而有漢代陶器及銅製搖錢樹等之發現，興縣等處亦有舊石器之發現，陝西扶風縣亦出土鐘鼎甚多。今後如能爲有計劃有系統之發掘，或可獲有早於商代之有銘器物。

（註六）傳世之商代鐘鼎，以「戊辰彝」之銘文爲最詳。其時代約在武乙以後，帝辛以前。——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上冊，頁十三——十八。

（註七）安陽殷墟（小屯村）出土之甲骨，爲帝乙及其以前之物；安陽侯家莊所出土者，第二層屬於厲辛庚丁之時；第三層屬於帝乙至帝辛（紂）之時。

（註八）殷本紀謂盤庚三篇作於盤庚之弟小辛在位之時。

（註九）黃帝、炎帝、共工、太皞諸氏及少皞與顓頊之事，見於昭公十七年傳；少皞有叔四人，見於昭公二十九年傳；高辛氏有子二人，見於昭公元年傳；堯舜八元八愷之事，見於文公十八年傳；大禹鑄鼎之事，見於宣公三年傳；啓會諸侯於鈞臺之事，見於昭公四年傳；后羿寒浞之事，見於襄公四年傳；孔甲緣黿之事，見於昭公二十九年傳；皋葬於穀之事，見於僖公三十二年傳；仲虺爲湯左相，見於定公元年傳；武王克商，見於宣公十二年傳；周公封建，見於僖公二十四年及定公四年傳；昭王南征，見於僖公四年傳；穆王西巡，見於昭公十二年傳；夷王受諸侯愛戴，厲王遭萬民怨憤，見於昭公二十六年傳。

（註一〇）此數篇皆今古文所共有者。

（註一一）魯頌記述伯禽，莊公、僖公之事，商頌記述成湯武丁之事，皆作於春秋之時。

（註一二）宋懷宗輯太平御覽引古本史記，殷代諸王多有年數，如太庚在位二十五年，小甲在位十七年，今本俱逸。

（註一三）參看王國維觀堂集林，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

茲依甲骨文所載之商代及其先世列君之名，重譜世系如左。

